

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 认知与对华战略

America's Reflection on "China's Rise" and
China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王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 认知与对华战略

AMERICA'S REFLECTION ON "CHINA'S RISE" AND
CHINA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王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对华战略/王辉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4
(国际政治论坛)
ISBN 978 - 7 - 5201 - 0337 - 4

I. ①冷… II. ①王…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 - 对华政策 - 研究 IV. ①D871. 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8808 号

· 国际政治论坛 ·

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对华战略

著 者 / 王 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祝得彬 赵怀英 孙连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337 - 4

定 价 / 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出版获得国际关系学院 2015 年国关文库出版项目支持

目 录

导 论 // 001

第一章 认知的概念、理论与应用 // 021

第一节 基本概念の界定 // 022

第二节 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认知理论 // 029

第三节 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 // 036

小 结 // 043

第二章 影响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因素 // 044

第一节 影响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政治文化 // 044

第二节 影响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外交思想 // 062

第三节 影响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历史与现实因素 // 064

小 结 // 075

第三章 克林顿执政时期的对华认知与战略 // 077

第一节 “中国崩溃论”与“以压促变”政策 // 077

第二节 “潜在军事对手”与“遏制性接触” // 089

第三节 可演变的对象与“全面交往”政策 // 099

小 结 // 105

第四章 小布什执政时期的对华认知与战略 // 107

第一节 “战略竞争对手”与“预防性遏制”战略 // 108

第二节 “反恐伙伴”与中美“建设性合作” // 115

第三节 “利益攸关方”与“对冲战略” // 122

小 结 // 137

第五章 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对华认知与战略 // 139

第一节 “应对危机的伙伴”与对华务实合作 // 140

第二节 “中国崛起”与“亚太再平衡战略” // 150

第三节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调整 // 172

小 结 // 198

第六章 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逻辑 // 200

第一节 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特点 // 200

第二节 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政策影响 // 210

第三节 中国影响美国对华认知的对策思考 // 215

小 结 // 220

参考书目 // 224

导 论

一 选题背景及意义

（一） 选题背景

21 世纪以来，“中国崛起”成为更为确定的趋势。“中国崛起”本质上是中国内部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结果，但必然产生明显的外部效应。即使是和平崛起也必然导致大国间权力分配与观念的变化，冲击美国主导地位以及现存国际体系。在单极体系中，霸权国的威望及其对霸权秩序的稳定最终取决于其超强的实力。作为体系中的霸权国家，美国对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变化往往比其他国家更加敏感，这为美国关注“中国崛起”提供了足够的动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美国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日益演化为更具现实意义、更富有争议的问题，成为美国各界关注的焦点。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化。中美关系的不稳定主要是美国的政策改变引起的。相对而言，中国对美国重要性的认识比较稳定，中美关系曾长期被中国视为大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更是因为这涉及中国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因此，稳定合作的中美关系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冷战结束初期，中国领导人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

合作，不搞对抗”的对美外交基本原则。而美国对华政策则呈现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中美关系也缺乏清晰的定位，这与美国对中国的认知有关。对美国而言，“中国崛起”既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主观认知的结果。在国际关系中，不同主体对同一事实往往形成不同的认知，只有被主体接受时“威胁”才是“客观的”。冷战后美国国内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并没有形成广泛共识。美国内部围绕“中国崛起”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中国是否能够崛起，“中国崛起”后是否会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其核心问题是美国最终是否能够接受中国这样一个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迥异的国家在综合国力上赶超美国的现实。

美国对华战略是影响“中国崛起”进程及方向的关键变量之一。但现有研究过于关注中美力量对比、美国对华战略、中国外交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等，而对美国内部对中国认知方面的研究重视不够。迄今为止，国内外对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发展演变过程缺乏系统的研究，更没有对这一过程背后的逻辑进行深入思考。广义上讲，“认知”是非物质层面的观念范畴的概念。观念是对外政策分析框架中的一个独立变量。美国国内政治观念、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美国精英的精神世界中。观念并不能直接决定国家的政策与行为，但观念造就对世界的认知，为利益驱动的对外政策确定方向。如果把“认知”作为中美关系中的常量，利益关系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美国的对华政策，但不能因此而忽略“认知”的作用。正如冷战所生动诠释的那样，随着美苏对抗的升级和持续，对抗双方都越来越认为对方侵略成性，从根本上认为对方的目标是不可接受的，意图是恶劣的，从而变为只关注能力和决心的简单认知方式。其结果是，双方对彼此的目标和意图毫无兴趣，只剩下能力和战略决心。如果中美陷入冲突的情境之中，彼此把对方看作具有威胁的恶意国家，那么无论中国采取何种政策，美国都会进行负面的解读并

采取对抗性政策，“大国政治的悲剧”不可避免。美国对中国的认知是如何形成的？认知如何发生变化？现有研究对这类问题没有回答。本书将围绕冷战后美国内部对“中国崛起”的争论而展开，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主要认知是什么；这些“认知”形成与变化的基本逻辑是什么；“认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选择。

（二）理论与现实意义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整体上通过“接触与对话”保持了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并“引导”中国“以负责任”的方式逐步融入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则采取优先发展经济的策略，尽量降低对美国权力地位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冲击。中美双方避免了权力政治的冲突，延缓了回答“大国崛起与权力转移”问题的紧迫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经济发展态势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整体实力相对其他大国明显上升。对中美实力分配的变化和中国战略能力的提高，美国表现出明显的“霸权焦虑”，担心“中国崛起”会威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凸显了中美间根本性的结构性矛盾。虽然中美间的冲突与对抗并非不可避免，但它依然是可能的。有学者认为，中美正在进入“权力转移”的敏感期，准确客观理解彼此的战略意图十分重要。因此，了解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对准确客观地理解美国对华战略意图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美国的认知是“中国崛起”外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影响亚太安全局势的关键因素。美国的判断和反应将会对“中国崛起”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对美国战略意图的误判将会导致中国对整个外部环境的错误估计。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认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决策者的认知是错误的，他的理解就会错误，从而做出错误的反应。历史上，朝鲜战争

是“苏联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中国绝不会出兵朝鲜，带给人们深刻的教训。长期以来，“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存在较大影响，但其主要来源并非中国本身，而是美国对中国一种根深蒂固的主观认知。

人们常说国际环境的变化引起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或者国内政策的变化导致外交政策的变化。但是实际上，所有这些因素本身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外部环境或因素都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信仰、认识、态度、个性等构成的凸镜的“过滤”才会变得有意义。换句话说，这些外在的因素只有被决策者观察到，并被决策者在决策时考虑在内，才会成为影响外交政策决策的因素，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实际上，无论认知是否与现实情况相符，它都是行为体进行判断和行动的基础。有时认知甚至比现实更加重要，它能对行为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此，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框架、理论基础与思维逻辑，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2. 从美国内部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差异，发现其对外战略调整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仔细观察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发现美国对华政策不是简单地建立在成本和收益计算基础之上，也并非单一国家主体为“统一的国家利益”或“追求共同国家目标”的产物。“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本身也是认知的产物。政府是由持有不同观点的组织和个人组成的。政府决策时常是决策者的观念及其政策主张竞争妥协的结果。美国内部对“中国崛起”存在认知差异。这种差异并非恒久不变，而是在不同时期，随着中美实力分配的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这种变动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美国战略界整体上对“中国崛起”的认知。美国对华战略演变必然反映美国长期的战略取向与战略目标。从“认知”演变的视角观察美国的对华战略，对我们更加客观地评估当前的美国对华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是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

经过 30 多年持续高速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贸易、投资等各个方面均跻身世界大国行列，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发展模式、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均有了较大的提升。然而，中国“和平崛起”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业。中国“和平崛起”进程是否能够继续延续，能否破解大国崛起的困境，并非中国能够单方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认知与反应。因此，了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客观地把握其战略意图，主动地塑造和平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4. 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双方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存在高度的共识。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内部面临程度不同的增长困境，担负着社会改革的重任。尽管两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的制定、地区多边机制主导权、美国强化亚太军事同盟以及扩大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等问题上分歧明显，但两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双方合作的重要性和努力的意愿。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奥巴马政府尽管反应消极，但也并不反对。中美双方都注意到了历史上因大国崛起而爆发的冲突，试图避免大国冲突的历史悲剧。如何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不仅是中国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中美两国学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理性客观地看待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态度，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 研究现状与文献回顾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关于“中国崛起”的研究日益成为中美两国学界和战略界的一个中心议题。“中国

崛起”问题越来越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直接成为影响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研究队伍不断扩大，许多重量级学者和政治家加入讨论，研究的重心逐渐从大学转向思想库和战略界，观点也逐步趋于理性，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在美国方面，近年较为重要的新成果有约瑟夫·奈的专著《美国世纪是否终结》（2015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合著的《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2015年）；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中美军力对比：兵力、地理、力量平衡的变化（1996~2017）》（2015年）；美国国务院和国家情报委员会顾问罗伯特·哈迪克的《中美海上争锋》（2014年）；罗伯特·卡普兰的《亚洲大熔炉——南中国海问题与太平洋安定局面的终结》（2014年）；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和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隆合著的《战略安抚与决心——21世纪的中美关系》；斯坦福大学布鲁斯·琼斯教授的《美国仍将领导世界——对抗与克制的平衡》；耶鲁大学斯蒂芬·罗奇教授的专著《失衡——美中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2014年）；中国问题著名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家沈大伟的两本专著《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2013年）和《纠结的大国》（2012年）；鲁奇尔·夏尔马的《经济突破型国家：追逐未来经济奇迹》（2012年）；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出版的《中国的内部困境：圆桌讨论》；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的《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2012年）；美国匹兹堡大学威廉·W. 凯勒和托马斯·G. 罗斯基教授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崛起与亚洲势力均衡》（2010年）；扎卡利亚的《后美国世界》（2009年）；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布拉曼宁《蚀：在中国经济主宰阴影下生活》（2011年）；亨利·基辛格的《论中国》（2011年）；乔治城大学教授库泊辰的《非任何国家的世界》；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达

龙·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共同撰写的《国家因何衰落：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2012年）；罗伯特·卡普兰的《地理的复仇：地图预示我们未来之冲突和命运之抗争》（2012年）；美国外交问题专家伊恩·布雷默的《独自为战：G零世界的赢家与败者》等。

中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中国崛起”。阎学通的《“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①和黄仁伟的《“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②是早期的两部专著。此后，“中国崛起”的命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美国如何回应“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也开始研究美国内部因素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从外交多元决策过程、政治制度特点、独特的价值体系等内部因素思考美国国际行为的内部根源。如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的两本专著《大国战略》（2016年）和《大国关系》（2015年）。清华大学楚树龙教授等的专著《美国政府和政治》（2012年）具有代表性，该书提出“一个国家的根本不在外部或外交，而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在于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观点。^③该书全面分析了美国历史和政治传统、美国基本政治制度、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结构、美国政治运行，以及美国政府外交和安全政策等。陶文钊主编的《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归纳了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一些基本特征，指出冷战后美国国内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决策中作用的增强；^④周琪主编的《美国外交决策过程》探讨了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的决策过程，指出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决策并非仅仅是为实现战略目标而进行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而时常是受诸

① 阎学通：《“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② 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③ 楚树龙、荣予：《美国政府和政治》，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第1页。

④ 陶文钊主编《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2006。

如国会、智库、利益集团、民众舆论等众多因素影响的一个复杂博弈的过程。^① 整体而言，从美国认知的视角研究“中国崛起”，还没有引起中国学者足够的重视。不过还是有一些学者对此做了有益的探索。陈积敏在《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演变与中美关系》一文中指出，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与建构不仅是美国制定对华战略的重要依据，也是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② 唐彦林在《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对策及中国的应对》^③ 一文中认为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的关系问题，是美国认知“中国崛起”的重要视角，提出“挑战论”“融入论”和“替代论”是美国认知“中国崛起”的三种主要观点。作者从权力、秩序制度以及观念和身份的角度对中国与现行秩序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

整体而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近期中国不太可能成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势均力敌的对手。约瑟夫·奈在其专著《美国世纪是否终结》中指出，尽管中国近年来在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全球影响力日益提升，但远不足以对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构成威胁。无论从相对还是绝对意义上，美国世纪都不会走向终结。^④ 沈大伟在《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⑤ 中指出，尽管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但中国仅仅成功地成为全球事务的参与者，而不是全球大国。因此，只能说中国是“不完全”大国。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谢德华在2012年再版的《中国的逻辑：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不会威胁西方》^⑥一书中提出，中国的发展

① 周琪主编《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② 陈积敏：《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演变与中美关系》，《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

③ 唐彦林：《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对策及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

④ Joseph Nye, *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5, p. 1.

⑤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⑥ Edward S.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是一种按照西方思维、融入西方体制的过程。麦克巴尔的《谁害怕中国：中国软实力的挑战》^①一书则理性分析了西方人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心态。约翰·伊肯伯里教授认为，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不仅有利于美国地位的维持，它对中国同样存在强大的吸引力与约束力。在这种条件下中美可以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②同伊肯伯里类似，康灿雄从经济相互依赖与地区一体化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其东亚地区邻国与美国的支持，只要存在广泛的经贸合作，中国就可以实现和平的崛起，没有必要选择同美国发生代价高昂的冲突。^③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熊玠的《中国的第二次崛起：对理论的迷思、困惑、悖论和挑战》^④一书则从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诠释了“中国崛起”是历史上的中国在新时代的复兴，指出西方不必对“中国崛起”过于恐惧。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勒特韦克在《中国的崛起与战略的逻辑》^⑤一书中提出，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和阻碍越来越多，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的反对势力越来越趋向于联合起来抗衡中国，中国的未来可能会走向衰退。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可以塑造崛起的中国。虽然“中国崛起”将导致中美间冲突机会的增加，但美国仍有机会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规范中国的行为，促使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未来10年中美关系发展具有历史决定性意义。自现代国家体系建立以来，从未出现过像中美关系这么错综复杂的双边关

① Michael Barr, *Who's Afraid of China: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Soft Power*, Zed Books, 2011.

②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1, 2008, pp. 23-37.

③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42.

④ James C. Hsiung, *China into Its Second Rise: Myths, Puzzles, Paradoxes, and Challenge to Theory*, New Jersey: World Scientific, 2012.

⑤ Edward N. Luttwak, *The Rise of China vs. The Logic of Strategy*,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系，双方保持合作的同时都对对方怀有深刻的疑虑及潜在的敌意。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研究员认为，中美两国现在都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两国在各方面的互动都会对本国乃至世界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由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美国的学者和政策层都应该保持与中国的密切交往，以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前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美国驻中国大使芮效俭在《亚洲政策》期刊中的文章也认为，中美关系进入了关键时刻，双方必须保持谨慎与克制。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主编的《纠结的巨人：美国和中国》，^①书中多位知名学者从历史、国情、双边关系、地区、全球和未来发展等多个角度对复杂中美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作者们认为，中美关系的独特性在于“合作性竞争”，两国一方面紧密地相互依存，但另一方面双方竞争不断升级。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东亚事务高级主任的杰弗里·贝德2012年出版了专著《奥巴马与“中国崛起”：一个局内人论美国的亚洲战略》。^②贝德在书中为奥巴马总统的对华政策辩护，他认为在传统的安全困境中，各方都认为实力的增长是敌意的反映，并且以行动促成这一现实。而奥巴马总统努力寻找对华政策的平衡点，既保持美国的实力优势和对华实力增长的警觉又避免陷入传统的安全困境之中。2012年，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与美国军事战争学院的安德鲁斯科贝尔出版《中国对安全的探寻》^③，分析了中国发展的脆弱性，强调中美的良性互动可以达到双赢的结果。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在

① David L. Shambaugh, *Tangled Tita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2.

② 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View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Washington, D. 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3.

③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2012年的著作《权力大未来》^①中解析未来世界权力的布局。奈认为“中国崛起”将给美国带来挑战，但美国仍具有优势。他认为21世纪，中美两国将在包括经济、战略、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文化领域等在内的所有领域展开激烈的竞争，继“软权力”之后，“网络权力”是未来双方博弈的焦点。

简单来说，这种观点认为中美两国目前正处于关键时期，如果中美不能清晰地认识到恶性军事竞争可能会对两国关系产生的破坏，且没有实施缓解这一恶性竞争的战略与政策，那么双方和平发展的前景便不复存在。但这类学者并不认为竞争必然导致冲突，两国仍有机会避免两国军备竞赛与错误知觉的产生，推动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很难避免。这种观点认为，建立并维持地区霸权是大国不懈追求的终极目标。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压力下，国家必然追逐权力，权力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国冲突。在其2014年新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增加了“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一章，明确指出如果中国在未来数十年继续保持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其必将效仿美国在西半球的做法，谋求在亚洲建立霸权。中国与邻国存在众多领土争端。在这些争端中，中国实力越强大，就越要按照对其有利的方式加以解决。即使当前中国没有显露出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企图，但未来还是难以预测，中美合作的前景并不明朗，美国的最佳战略选择是尽早地遏制中国，并将谋求与中国的多数邻国结成“制华联盟”。未来亚洲的政治格局将是多个大国并存、中国作为潜在霸主的不平衡多极体系，这一体系比冷战时期美苏对峙的两极体系更加不稳定。中美之间的安全竞争将日趋激烈，在亚洲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容小觑，中国几乎不可能和平崛起。2015

^① [美] 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王吉美译，中信出版社，2012。